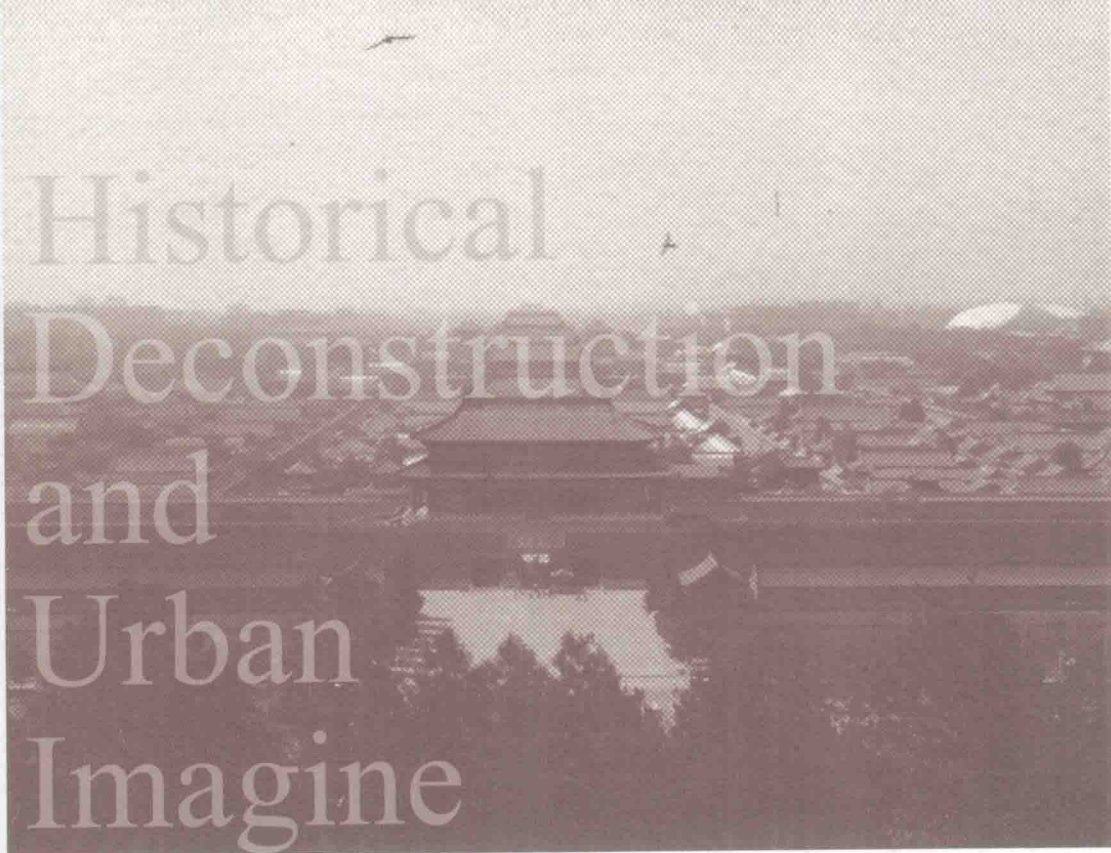




Historical Deconstruction and Urban Imagine

赫曦滢 / 著

历史的解构与 城市的想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历史的解构与 城市的想象

赫曦滢 / 著

Historical
Deconstruction
and
Urban Imagin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的解构与城市的想象 / 赫曦滢著. —北京: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 - 7 - 5097 - 6970 - 6

I. ①历… II. ①赫… III. ①城市空间 - 研究 ②城市化 -
研究 IV. ①TU984. 11 ②F291.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0513 号



历史的解构与城市的想象

著 者 / 赫曦滢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任文武

责任编辑 / 张丽丽 王 颀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出版分社 (010) 59367127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21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6970 - 6

定 价 / 5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城市出现是为了保护生命，它让生活变得美好。

——洛杉矶市政厅外墙上的铭文

◆城市是一幅染色体图：文本连绵不绝。

——罗兰·巴尔特 《符号帝国》（1982）

◆昨日美丽的乌托邦，将成为明朝振奋人心的事实。

——贝尔维尔，第一次共产党大会闭幕演说 1840年7月1日

这是一本关于城市的书。我会在书中介绍有关城市发展的基本观点，看待城市的不同角度，以及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形态下的城市存在怎样的不同。尽管卡尔·马克思并没有具体分析城市的本质及其意义，但他的观点在众多理论中仍具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对于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而言，意义更加深远。我将介绍从马克思、恩格斯到亨利·列斐伏尔、曼纽尔·卡斯特、大卫·哈维等人的学术观点，对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进行一定层面的理论梳理。纵观当今的城市学研究，还没有形成相对成熟、完整和认同的理论假设，而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和空间生产理论，则最有可能成为一般城市学基本假设，亨利·列斐伏尔等人对空间范畴的哲学探索、城市哲学解读，在一定程度上透视了城市的本质和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而这些理论在西方国

家的实践，也印证了空间范畴的可能的解释力。本书希望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和空间生产理论进行有益的探索与分析，帮助人们深化对空间的认识和理解，进而对运用空间理论反思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进行尝试。

让我现在就带您穿越时间和空间，踏上领略城市风景的旅程！

一 城市失序与新型城镇化的道路选择

毫无疑问，城市化已经成为当前引领中国发展的最重要的引擎。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化正快速推进，中国会仅仅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二三百年来才走完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促进了社会进步，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城乡的面貌。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化、空间生产已经到了不得不进行哲学反思，构建城市意义、城市秩序的关键时期，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正在加深、异化，城市充满了不可预见的风险和冲突。复杂无序、综合失序，是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大难题，也是城市化研究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中国以往的城市化研究一般都聚焦于城市物质形态的构建，而忽视了对城市性、城市意义、城市秩序与城市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但恰恰正是将城市整合为一个意义共同体，才是实现城市可持续繁荣的根本出路，才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必由之路。

究竟怎样的城市才是符合历史潮流发展方向的？怎样的模式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我认为，所谓的新型城镇化是建立一种新的城市文明生活方式，是改变传统农民生活的一种历史性改变。新的城镇，也会体现社会组织中与现代观念有关的原则，如合理性、秩序和效率等。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城镇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一个学校。城市是多个要素整合叠加的有机体，除了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角度去探讨，还应该从城市哲学的高度去分析与研判。在城市哲学的视野中，

城市问题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城市意义是城市有机体所有要素的深层连接纽带，城市意义的缺失或迷失，是导致城市问题的根本原因，一个没有意义归属与深层次秩序的城市繁荣是“虚假”的繁荣，充满着风险。城市意义与伦理的缺失，是人们将城市化简单等同于修路、建房、不断推进土地城镇化、提高城市人口数量和发展城市经济的重要原因，这导致了诸多城市社会冲突与城市心理问题，同时也导致了人们在城市发展中形成“物质幻象”与“权力幻象”。

列斐伏尔曾指出，当意义迷失时，“都市现实的危机比某种其他的危机更为重要、更为根本”。无独有偶，芒福德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世界对人类直接指挥的反应比任何时候都少，比任何时候都缺少人类的意义。”在科特金看来，在神圣、安全、繁荣这城市三大要素中，神圣（意义）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一切的核心。不论物质方面表现得多么有吸引力，都无法取代家庭、信念、邻里和文化等持久的纽带作用。“对全球史的研究也提示我们，一个没有道义约束或没有市民属性概念的城市即使富庶也注定会萧条和衰退。”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本书寄期望于透过五彩斑斓的城市现象，找寻城市空间与人类社会的内在关联，并透过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揭开城市隐秘的面纱，为人们展示城市最真实的一面。

二 城市性：人类文明的历史积淀

城市性，是城市研究的基础性问题。在理论意义上的城市性，就是对城市本质的反思与规范性的把握；在实践意义上的城市性，则是在城市历史发展中生成和显现的城市本质。对于城市性的思考早在500年前已经就开始了。历史学家斯本格勒曾说过：“一切伟大的文化都是市镇文化，这是一件结论性事实。”可以说，人类伟大的文化总是与城市的发展如影随形，这也是城市区别于乡村的价值所在，是人

们对城市向往的重要原因之一。早在中世纪，意大利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乔万尼·波特若就在《论城市伟大至尊之因由》一书中提出了“城市伟大文化”的建构与认知。“何谓城市，及城市的伟大是什么？城市被认为是人民的集合，他们团结起来在丰裕和繁荣中悠闲地共度更好的生活。城市的伟大则被认为并非其处所或围墙的宽广，而是民众和居民数量及其权力的伟大。人们现在出于各种因由和时机移向那里并聚集起来：其源，有的是权威，有的是强力，有的是快乐，有的是复兴。”我们惊叹几百年前的学者能够对城市有如此精辟的论述，虽然从中还能够看到对王权价值的认同，但通过这种独特的视角去发现城市的价值仍然十分可贵。在对于如何创造城市伟大文化的方式与途径方面他也说：“要把一城市推向伟大，单靠自身土地的丰饶是不够的。”城市的发展、建设与更新，要靠城市公平、开放和创造自由。

几百年来人类社会工业化、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历史不断印证了城市性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在芒福德看来，城市是以文化为轴心的综合容器；索亚认为，城市是不同要素的有机聚集体；列斐伏尔与哈维则看到城市是一种人造、人化的综合空间，城市也就是人对空间的具体生产；在科特金看来，城市是一种人所建构起来的新秩序，“城市也代表着人类不再依赖自然界的恩赐，而是另起炉灶，试图构建一个新的、可操控的秩序”。“人类用了5000多年的时间，才对城市的本质和演变过程获得了一个局部的认识，也许要用更长的时间才能完全弄清它那些尚未被认识的潜在特性。”由此可见，人们对城市本性的认识还处于过程中，在不同的时代城市性也有着不同的内涵与外延。城市与伦理是一个双向构建的过程，一方面城市建筑是具有伦理意识的人所构建的；另一方面，建筑又实践性地构建了人们的生活方向和伦理取向。伦理性是空间构成、生产和转换的最重要的基本属性。因此，构建合理的城市空间秩序要将伦理作为意向性的、规范性的、秩序性的因素来考虑。

当前，中国的城市性就是要构建一种“空间—伦理生态”，将伦理精神贯穿于城市空间建设的各个方面，由城市意义、城市精神、城市信仰作为统领和整合力量的实体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

三 中西方城市化认知的差异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政治经济体制，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对城市的发展起到了深远而普遍的影响。当我们深入了解城市时，就会发现城市在国家和文化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事实上，文化架构上的不同日益成为当今理解现代城市的重要方式。另外，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新的动力已经开始改变我们的城市生活，如手机、网络等。信息技术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是显著的，在伦敦、东京等全球经济大城市，信息技术已经改变了城市生活方式，人们不再局限于具体地点或地域的工作，城市已经代表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意义。

与西方城市化过程相似，中国城市化的外在表现也主要是以人口聚集为主要特征。但是，从内在表现上看，中国城市化在构成和序列上与西方城市大相径庭，甚至还有着强烈的本土化“制度型动力体系”构成特点。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依靠“政府的制度安排和制度保障”进行着高速的城市化，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的城镇人口就超过了农村，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实现了面向现代化的华丽转身。中国的“制度型城市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城市化的规划与战略都是由政府制定并带动实施的；第二，城市化与城市基本建设投资都是以各级财政为主体的；第三，城市人口的流向和规模控制是由政府掌握的；第四，城市土地是属于国有的。中国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具有很大的优势，中国仅仅用了几十年就完成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城市化过程，但是行政命令式发展模式也有着自身的弱点，当前中国的社会矛盾更加突出，这种现象说明中国的城市化

原动力不足、动力结构不够合理，其主要症结还在于中国没有本土化的科学的的城市理论来引导城市健康成长。

东西方社会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这不仅仅表现在制度架构与个体的价值观、人口数量与结构、教育水平与宗教文化等这些表面现象上，更是根植于文化的总体价值取向上。西方资本主义沿袭了欧洲古典主义思想，平等、自由、博爱等核心价值观从中世纪传承到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自然”形成的价值观念指导着西方的城市化发展，使西方社会发展实现了历史与逻辑的内在统一。在不同时代，社会结构、产业结构与文化结构的转型基本处于同步进化的结构变迁之中，并没有出现典型的“社会堕落”、“价值迷失”、“文化倒退”等社会现象。这证明了西方城市化发展走的是一条符合市场规律的道路，即由生产力的发展支配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的发展方向，以及人的价值观的变迁。因此，中西方的城市化走的是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虽然有一点交集，但是从城市化形态的前提、进程、节点和社会结构等很多方面看，都存在着巨大的不同。

西方城市的早期历史可以用城市经济和庄园经济这两种经济模式的共同发展来描述，我们称之为“双核动力的发展模式”，城市工商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庄园经济的衰退和瓦解正好又使大量的劳动力成为拥有人身自由的手工业者，并且很快这些人就转入大工业的生产中，成为第一批职业工人。西方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基本是同步进行的，可以理解为“双核地域空间模式”。而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集权的农业社会，可以被看作“单核地域空间模式”，城市在农业社会的包围中存在。在几千年的时间中，城市化并没有太大的进展，并且和农业、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理顺城市与农村的土地关系、契约关系等核心问题，中国的城市化与乡村的“脐带”关系仍然没有完全剪断。因此，新一轮的城镇化必须要在土地所有制改革和户籍制度方面出“重拳”，彻底扫清城市发展的制度性障碍，才能使中国的

城市化融入世界一体化、世界城市化的浪潮之中。

四 对西方城市化理论的再思考

弗洛伊德在《论文明》中说：“当一个人已在一种独特的文明里生活了很长时间，并经常试图找到这种文明的源头及其所有发展的道路的时候，他有时也禁不住朝另一个方向瞥上一眼，询问一下该文明未来的命运以及它注定要经历什么样的变迁。”毫无疑问，城市是社会发展的中心和原动力，全球化时代的发展经验和历史变迁已经证明，凡是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也都要完成城市化进程，几乎不存在例外。同样，中国的城市化历程也印证了要想更快更好地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目标，就必须总结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的共同规律，同时结合自身的发展优势和独特性，选择一条符合本国实际的发展道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城市化的理论和实践形成了一系列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成果，如城市空间正义理论、有机秩序理论、生态城市理论、适度缩进的城市发展理论、拼贴城市理论、花园城市理论、全球城市价值链理论、智慧城市理论、城市群理论等，这些理论经过很多发达国家的实践，已经成为推进人类城市进化的直接手段，中国也应该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不断吸收这些优秀的文化成果为己所用。

我注意到，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一批具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城市理论著作不断涌现。马克思主义与城市对话的再次兴起主要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开始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迅速崛起，一批理论家提出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使命，在城市研究中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提出了一定的政治实践目标。在马克思主义城市学研究中，列斐伏尔、曼纽尔

·卡斯特和大卫·哈维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特定学术领域的体现，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一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去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已成为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新的突破口。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学科和城市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一方面，对城市问题的分析，填补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空白，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通过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引入城市问题研究，突破了城市研究的传统视角，打破了城市学科的封闭性和局限性。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主要特点是延续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将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作为核心问题的研究方法，用实证主义方法突出强调了在城市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资本和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使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焕发了新的生机。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的城市现象相结合，更生动、更具体地揭示了城市发展的多样性，使得宏观理论得以解释更多的具体现象。这些理论对于最终构建中国的城市化理论体系与研究范式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而国内相关研究刚刚起步，基础薄弱，需要进行完善和再阐释。

我们不得不承认，虽然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但是面对着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人类可选择的手段却越来越少，甚至束手无策。即使是在早已完成城市化的发达国家，城市问题仍然层出不穷，如城市贫困、社会犯罪、社区隔离、城市住房、中心区衰落、城市蔓延等，这些问题在当今中国也更加凸显。这一方面是由城市本身运行的固有缺陷造成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前各国对城市化理论与模式的理解与择优运用方面都存在短板。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城市问题的研究都还远未结束，想要彻底解决城市“危机”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在建构本土化城市理论的过程中，对于外来理论进行批判式吸收是一个明智之举。在西方的城市化理论中，有些成果是有实用价值的，而有一些则是“乌托邦”，是缺乏实践基础的。虽然这些理论也有其合理内核，但也有历史和现实局限性，必须认真选择，优化运用。西方城市化的过程可以用高度集中与高度分散两种规律来描述，反映了一种“双重地域结构效应”。相应的，也出现了城市化理论“集中化”与“分散化”价值取向的分野，如果我们不认真对这两种模式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仅仅是简单地吸收和运用，就会严重误导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甚至陷入中国式“拉美经济陷阱”。本书的研究范畴基本涵盖了城市领域的重要主题，以新的角度与方法开启城市研究的新视野，具有前沿性、实证性和并置性特点，希望可以带给读者更多有意义的思考和启发。

参考文献

阿列克斯·英克尔斯、戴维·H. 史密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顾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奥斯瓦尔德·斯本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

乔万尼·波特若：《论城市伟大至尊之因由》，刘晨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目 录

第一章 城市空间的历史解构	001
一 城市空间的地理性历史	002
二 城市实践与“马克思的幽灵”	024
三 走向重新空间化的马克思主义	033
参考文献	047
第二章 城市、阶级与资本主义	050
一 “世界历史”视野下的城市变革	054
二 城市与私有制	060
三 微观视域下的资本主义城市	064
四 城市与阶级	067
五 城市空间形态学	074
六 住宅与乌托邦	080
参考文献	091
第三章 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转向	093
一 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研究的开启	095
二 从对象到视阈：都市化的意义转换	100
三 城市革命	113

四 空间的生产	120
参考文献	133
第四章 城市与消费社会	136
一 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138
二 跨文化的城市社会运动	146
三 网络社会中的城市	163
参考文献	175
第五章 当代资本的城市化实践	177
一 时空动力学与城市发展的现实语境	179
二 资本主义积累的地理	186
三 空间的资本化生产——时空修复	191
四 新帝国主义的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	200
五 意识的城市化	210
六 资本主义的预言	214
参考文献	221
第六章 城市的想象	223
一 危机中的城市	225
二 后现代城市的话语体系	230
三 可能的城市世界	239
参考文献	244
结 论	245
后 记	248

第一章 城市空间的历史解构

◆这本书从一座城市象征的是一个世界开始，在世界许多实际方面已变成一座城市结束。

——L. 马福德《历史中的城市》（1961）

◆最初的城市（作为城市—国家）伴随着掌握符号形式的集中和用来通告、典礼、行政、文化移入、规训和控制的市政中心而出现。在已制度化了的城市中，附着着人们和他们空间性的社会关系，创造出了一个市民社会和相应的建成环境……城市持续地通过两种交互式方法——监控和依附——被组织起来，权力的全景之眼对城市从里到外进行观察。被都市化意味着依附，在一个扎根于 polis（政治、政策、政体、管辖）和 civitas（民间、公民、公务员、公务、文明）扩展中的集体意识形态和文化中被迫成为一个依附着或者一个信徒……对于福柯来说，空间就是关于权力和知识的话语被转换进权力的实际关系的地方。但是这些“条律”从没建立一个与世隔绝的领域。它们只有与经济、政治或制度结合时才有意思。因而建筑和城市规划为理解权力是怎样运作的提供了很多的例子。

——爱德华·索亚 《第三空间》（1996）

◆当代城市的本质是一种地方或区域性“社会经济”……一团特殊的、有差别的和地方化的社会关系……那些单元的经济运转必要的个人和组织间的具体关系。城市是这种关系承传的场所，不同城市拥有的关系是不同的。在城市里，经济活动密集攒动……它们在间接或迂回的互相依赖中各具特点，并且在这些传统和关系中逐渐成形。

——斯托帕·米切尔《地区世界：全球经济中的区域发展》（1997）

一 城市空间的地理性历史

正如 L. 马福德在《历史中的城市》中所描述的那样，一座城市象征的是一个世界的开始，城市世界始终伴随着人类的产生和发展。而现在，世界在很多情况下，已经变成了一座城市，城市的生活方式正以惊人的速度延伸到地球的每个角落。在这本书的开始，笔者将描述一个“城市空间的地理性历史”，有选择性地游历千年的历史，回溯城市的开端，远到简·雅各布称为“城市之光”的古代，近到资本主义时代的城市，重绘城市的起源与发展。

本书关注的重点，并不是简单地追溯都市生活的源头，也不是为了仅仅描述都市发展的历史，而是通过这种在时空中的不断往返与思考，对城市和人类社会历史的地位、发展途径做出更深刻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不再是研究城市如何发展和变换这些表象的问题，而是通过对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审视，对我们的世界和生存的核心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还原人类社会的本真。

重掘都市之源

正如人类的进化一样，城市的进化也有一条既有的程序：首先是

小规模的人类集中生活，通过狩猎或者采集的方式生存。在人类早期阶段，二三十人的小型社会组织是最常见的，性别角色标志明显。在这样的群体中，劳动分工按性别划分，男性基本上负责狩猎，同时保护采集场所和捕鱼；而女性基本上负责食物的采集和日常家务。在40000年前，大部分这样的小规模社群定居下来，定居点的建立是人类社会的明显进步，但是这样的定居点还是临时的，变动很大。距今大约10000年，为了应对气候的变化，人们不得不开始种植作物和饲养牲畜。世界上出现了第一批永久定居点，开始了植物种植和动物驯化的过程，将人类社会逐步带进了完全和有意识的农耕业和畜牧业社会。新石器时代到来了，城市的雏形正在形成。

与农业时代一同到来的是小村庄的兴起与发展，那时最原始的贸易方兴未艾，在不同村庄之间进行的交换和买卖变得更加频繁。这种新的定居模式带动经济社会全面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人口稠密的聚居区，以家族、姓氏和血统为基础的社会秩序逐渐产生，“宗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新的政治形式——“酋长制”或者“村庄政府制”。这种在一定区域内的新的农业社会，使人口不断集中，食物出现了实质性富余，也出现了重要的发明和创造，灌溉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部分。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还没有出现，城市—国家的机制还在摇篮时期，真正的“初始化”城市还要再等4000年才会出现。城市的起源有诸多原因，爱德华·索亚认为：“大规模灌溉控制技术的管理要求，远距离经贸导致的新经济机遇，与更可靠、持久的食品富余密切相关的创造，亲属关系及其运作机构的不断发展，宗教与仪式行为及其保持与再生，比从前有更大规模社会能力的扩张，为了抵御自然与外界侵袭日益增长的需要，由数量增长和环境恶化所带来的人口压力，等等。在这些原因里，有些人还会至少把村镇合并到更大的都市中去的意义上，加上村镇联合的冲击这一条。”这些原因在历史的某一个点上同时具备，这种“巨大的冲击”创生了实质上的都市革命，